

论美华文学中不同代际的纽约书写

陈涵平 吴奕铸

内容提要 在美华文学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代作家都展开过“纽约书写”。他们在叙写各自对纽约的不同体认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展现出自身所处时代的诸多特色。因此，纽约书写，就不仅仅是华人移民个体生存经验的展示，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心灵史的叙述。

从20世纪初赴美移民被拘禁在天使岛时写就的“木屋诗”算起，美华文学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美华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20世纪初叶至三四十年代为第一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为第二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为第三代；新旧世纪之交赴美的为第四代。在这四个代际的美华文学中，每一代中都有作家进行过“纽约书写”，而且他们在展示各自对纽约的不同体认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展现出自身所处时代的诸多特色。

众所周知，纽约是美国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也是美国所有城市中最富于全球化气息的大都会，纽约因此成为了代表美国甚至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所以，不同代际的美华作家都对其给予深度关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本文所谓的“纽约书写”，是指不同年代的美华作家有意识地以纽约为其主人公生活与活动的背景，藉此叙写他们不同的生存形态、情感方式、文化碰撞和身份重建，以及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纽约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也就是说，这种“纽约书写”并不仅仅指涉以纽约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而且还进一步指向书写者对纽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在这样的“纽约书写”中，纽约就不只是一个背景，也是一个对象，还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载体。正是在此种理解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林语堂、白先勇、周励、裔锦声的四部小说为例，既探究四代作家如何展开对纽约的不同书写，更力图挖掘这种书写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味。

一 林语堂的《唐人街》——迁徙中的持守

林语堂作为近百年来赴美第一代华文作家的重要代表，其在海外多年的文学创作，始终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他的《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作品在海

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唐人街》，着重描写在纽约生活的一个华人家庭30年代的生活经历。故事的开始是冯太太带着一双小儿女（汤姆和伊娃）从中国广东来到纽约，与已经在美的丈夫冯老二团聚。一家人团圆之后，冯氏夫妇就为全家立定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搬进唐人街并在那里开一家中餐馆。尽管小说也展示了冯家为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命运遭逢，但作者的主要目的还是试图借此揭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通过与西方文化的对比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向往。

这一主旨在作品中的渗透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对汤姆和他的两个哥哥的婚姻的描写上。大哥秉承父亲勤劳节俭、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和父亲一起兢兢业业地操持着洗衣店。他与意大利姑娘弗罗拉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不久顺利生子，两人的婚姻幸福美满；二哥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染上了西方社会爱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的恶习，并且不择手段地追求风月场上的摩登女郎，尽管两人最终走到一起，可不到两年，因男的沾花惹草、女的感情不贞而宣告婚姻破裂；冯家的大儿媳弗罗拉是美籍意大利人，她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气息，嫁进冯家后多次对丈夫提出要过西方式的独立自由的小家庭生活，但在丈夫的劝导和影响下，加上大家庭中互谅互助、其乐融融的亲情感染，最终深深地爱上了这种大家庭生活。汤姆与艾丝的相爱和结合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内容。汤姆之所以爱上来自中国内地的艾丝，首先是因为“她的外貌像极了中国传统仕女图上的美女”，其次是艾丝身上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使汤姆非常迷恋。汤姆是带着敬畏的感情走近艾丝的，因为在他的心中“艾丝就等于中国，等于中国文学”^①。汤姆在艾丝的影响下投入地学习《老子》、练习书法，进而生发对中国文化的无穷热爱。汤姆对艾丝的爱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汤姆对中国文化的深深依恋和热切向往。

小说中,不管是大哥、二哥不同婚姻的对比,还是大嫂前后态度的转变,抑或是汤姆本人对艾丝的追求,都在在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可贵与伟大。

作品题名《唐人街》,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上述题旨的暗示。唐人街,是海外华人的聚居区。在这里,华人的生活习俗、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依然多从母国旧制,因而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生活和文化圈子。这一特色使唐人街在其历史变迁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而且还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社会在海外的延伸,成为借他族空间保存自身传统与文化的独特区域。因此,在林语堂的文学传达中,华人在异域的拼搏,无论在物质境况上如何得益于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但在文化选择上最终仍然是向母国文化回归。作品的这种处置显示出,当林语堂的目光扫描“纽约”的时候,他的焦点却还集中在中华文化的聚集地——“唐人街”。

林语堂所生活的20世纪初期,既是中国战乱频仍、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大都自觉地担当着振兴中华复兴传统文化的重任。因此,他们的文化立场始终没有离开本土,对西方文化的取用目的始终以母国为中心,并将自己创作的核心定位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一批留学异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国外积极扮演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而且回国之后大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角色。这就不难理解,林语堂在创作以异国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唐人街》时,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表现美国社会或美国文化上,而是将视野集中在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纽约唐人街,因为,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目中,“唐人街”是中國人在异域坚守中华文化的象征,是流徙他乡的中國人的心灵归宿。

二 白先勇的《纽约客》——放逐中的冲突

《纽约客》是白先勇旅居美国之后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集中共有9篇小说,除《香港——一九六零》外,其余均为描写在美华人的生活故事。这是一批在特定时代迁居美国的华人,他们身上明显地刻印着时代所赋予的“边缘人”的痕迹。对于这种边缘身份,白先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而《纽约客》就是对这种认识和体验的生动诠释。

《芝加哥之死》是这部小说集的开篇之作,也是白先勇赴美后创作的第一个短篇。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吴汉魂从台湾来到美国,经过六年苦读,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的当晚,面对极度的寂寞和突然的松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一个老妓女的引诱,倒在她的怀抱之中。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随即在绝望中投湖自尽。小说的故事轮廓比较简单,然而其中所包孕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内蕴却较为复杂。吴汉魂在求职信的“自传”一栏中把自己定位

为“中国人”,吴汉魂的身份定位明显处在矛盾之中。当年他抛却年迈的母亲,丢下温柔的女友,从台湾到美国来学习西洋文学,是他背弃母族文化向往追求西方文化的行为结果。然而他一踏上美国这块土地,便即刻堕入生活的底层,在异质文化的挤压中苦苦挣扎,这一切又使他对西方文化难以亲近。于是,吴汉魂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边缘人——他有意远离中华文化,事实上却难以真正割断原有的文化脐带;他主动投身西方社会自觉接纳西方文化,西方社会却不愿接纳他,而且自己的内心也无法彻底认同。这种既无法决绝又难以彻底依附于居住国文化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态度,导致了吴汉魂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摆荡,以及由此引起的在其内心深处推挡不开的矛盾和痛苦,最终决定了他只能以死亡来完成自己的文化选择。这种身处异质文化之间而无所适从的矛盾冲突,不仅在《芝加哥之死》中有着强烈的体现,而且也弥漫于《纽约客》其他篇章之中。如《安乐乡的一日》表现坚守中国人身份的母亲依萍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國人的女儿宝莉之间的尖锐对立,《火岛之行》描写具有东方传统美德的林刚与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女友们的隔膜尴尬,《谪仙记》展示象征着“中国”的李彤身上所具有的典雅高贵的贵族气息与美国社会低俗享乐的大众文化的格格不入,《上摩天楼去》通过两姐妹由亲密无间变为疏远隔膜的情节来显示唯美精致的中国文化与功利世俗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突。总之一句话,文化冲突成为了《纽约客》中贯穿始终的主题。

小说集以《纽约客》命名,一个“客”字,正好道出了这一代华人移民文化冲突的根源。当他们在政治纷争、经济厄境、人生桎梏的多重困顿中无奈地离开家园时,曾经满怀着到一个异乡寻找理想归宿的梦想。然而他们最终发现,纽约既不是他们原先所想象的可以舒适寄寓的居所,也不是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这个屹立着自由女神的世界港口,并不能为他们“失根”的精神提供一个坚实的寄托。他们在这里不管生活了多久,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纽约客”,是无法将灵魂安放在这个城市的永远的流浪者。正如《上摩天楼去》中一段所描写的那样:“站在皇家大厦顶上看纽约,好像从天文台的望远镜,观察太阳系的另一些星球似的,完全失去了距离与空间的观念,只见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里,一堆堆、一团团的光球在旋转、在晃动^②。纽约,在“客”居此地的这一代华人心中,永远是那样的遥远和模糊,永远是排斥于心外的异域。

白先勇作为中国分裂状况下迁徙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和同时代许多“无根的流放者”一样,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再到美国这样的“双重放逐”。第一次被动放逐后由于政治隔绝造成了与故乡可望不可及的阻断,第二次主动放逐却又被异质文化和母体文化的双重重负挤压在边缘而无所适从。因此,他们把自己当作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中被抛出主流社会的一群人,在感同身受着一个复杂而沉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同时,还不断地在传统

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个人与家国的矛盾中迷惘地冲撞与挣扎，精神上的空虚与软弱使他们无法找到灵魂栖居的家园。因此，虽身处“纽约”，却依然感觉是羁旅他乡，始终无法消除文化的“客”居心态。纽约，只能是他们心灵漂泊中的一个驿站。

三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迷失中的异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发了一次规模宏大、持续久远的移民浪潮。在这一浪潮的推波助澜下，新移民文学也风生水起。80年代中期，旅美留学生苏炜、查建英发表了一系列反映留学生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滥觞。数年之后，随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小说在90年代初期的相继发表，尤其是《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大陆热播之后，相关题材的新移民文学作品也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周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叙写一个怀揣40美元来到纽约的中国女人，“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③这样的传奇故事毫无疑问使当时沉醉于发家致富梦想中的中国人兴奋莫名向往不已！然而，当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再来看这部作品，我们发现作品中明显地蕴含着一种对西方文明极度向往和自觉臣属的情结。这种西化情结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自我矮化和否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主要采用对比策略来显示过去在国内的痛苦和今天在美国的幸福：描写国内生活的前半部分，基本重复着“伤痕文学”的故事，主人公出生在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从小就遭受老师的歧视和同学的欺侮，父母在“文革”中双双挨斗，自己被迫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成年后又经历短暂而痛苦的婚姻；而当她来到纽约之后，生活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业顺利完成，重组的异国婚姻美满甜蜜，经商大获成功，年年都能自由地周游世界。可以说，这另半部书简直就是一份来自天堂的幸福报告。而作者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对比结果，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西方文明多好！二是对西方（美国）文明的迎合和倾倒。这样的例证在书中比比皆是。如书中列出并征引有关自我修养的书目100多种，只有十余种属于中国，其余全部是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作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句就职誓言“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书中多次出现，成为主人公的人生信条。又如书中有十余处地方描写纽约、赞美纽约，并通过与上海的比较指出，纽约“才是冒险家的真正乐园”、“是世界的中心”、“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城市，她“为生活在纽约而自豪”。

上述种种从文化上、心理上、行动上甚至是性行为上

对西方的极度崇拜，处处强烈地透现出主人公一种独特的文化心态——处于文化“低势态”的中国人面对“高势态”的西方文化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和迎合欲望。显而易见，这是处于贫困落后且又失去文化坚守的第三世界对富裕自由的第一世界心甘情愿的仰视的结果。因为在“朱莉娅”（小说中主人公的英文名——笔者注）们对世界的认知中，“西方——他们想象的西方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对象，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价值”^④。于是，作为西方文明典型标本的纽约曼哈顿，便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居所。也正因此，朱莉娅们才如此自得地为来到美国而激动不已，为生活在纽约而骄矜，为成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而自豪。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所产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多变的时期。传统文化的影响骤然消退，西方文化的辐射无孔不入。在这种整体的民族文化身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不少人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转而习惯于用强势文化的视角反观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反观中，传统文化往往十分轻易地被弱化、被诋毁、被驱逐，而西方文化则成为无限向往和狂热追逐的对象。《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中国女人”（弱势文化的代表）向“曼哈顿”（强势文化的象征）的进发和迁居，只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合乎逻辑的展开而已。

四 裔锦声的《华尔街职场》 ——融合中的新变

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华文学，随着多元文化对话交流的渐次扩展和深入，渐渐地流向更为宽广的洋面，并形成了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这一代际的美华文学在“纽约书写”方面，呈现出了某些方面的新质，而裔锦声的《华尔街职场》就是其中一部别具特色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两位中国人——陆乔与兰邦丽——在华尔街商战中的拼搏经历以及相互间的恋情。陆乔与兰邦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先后进入华尔街的美洲集团工作。小说以陆乔主管的一个有关风险控制的电脑程序升级项目作为情节线索贯穿始终，藉此表现出华尔街严峻的职场环境，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变化和情感波澜。作为财经题材的小说，作品通过描绘现代金融中心的职场政治，展现出丰富的市场经济的信息，从而使“华尔街”“职场”此类术语无可争辩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符码。而作为文化文本，它所描写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陆乔在美国主流社会打拼的过程，则透露出较为丰富的人文内涵，这种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人公真正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平等融洽的身份定位。陆乔工作在一个特定的场域——华尔街，“这条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仅1000米长的狭窄街道，早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文化地标。”“这里是一流的人脑和一流的电脑

齐聚的地方。”^①在这里工作已经成为值得自豪的身份标志。而新移民陆乔不仅拼搏在华尔街，而且站稳了脚跟，还被提升为公司的副总裁和重要项目的主管，从而成为华尔街的佼佼者。可以说，整部小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国籍、种族以及文化问题的牵制与纠缠，主人公也因此能够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不断进取，并取得骄人的成就。正因为有这样充满着华尔街气息的氛围，陆乔从不敏感于自己的中国身份，他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不要提醒我是中国人，我只不过比美国人晚到这里200年而已！”^②这种自信而又自豪的身份确认是以往的美华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二是主人公展现出适应和融合不同文化的开放性格。陆乔在中国读完大学后再到美国留学，应该说他的文化性格在其出国前已经基本定型。因此，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他最初进入华尔街时表现得相当突出。他行事低调为人谦虚，因此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叫他“好好先生”(Mr. Nice Guy)。然而，这些“中国”性格在波诡云谲竞争激烈的华尔街并不能为他带来善果。相反，只有在他痛下决心告别“中国”式的“好好先生”行为准则，真切地践行华尔街所信奉的一整套游戏规则的时候，他才获得了可喜的成功。后来他毅然担任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项目(CRMS系统升级)的负责人，在人员组合时敢于辞掉不称职的洋下属，项目终结时能在美国上司面前明辨责任分清是非，并对推卸责任的上司勇敢地说不，然后以十足的信心和过人的胆识开拓人生的新局面。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陆乔与过去的他判若两人。“陆乔成熟了，与原来那个羞涩的中国陆乔发生了本质上的决裂。今天，陆乔已经从他那坚硬的‘中国甲壳’中破壳而出。”^③陆乔以自己开放的姿态和宽阔的胸怀从单一文化的桎梏中脱颖而出，并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完成了性格蜕变。“华尔街”的职场政治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知识分子——陆乔！

陆乔在华尔街的奋斗以及成功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形象逐步显现、逐步成熟的过程：陆乔真正融入纽约华尔街的身份定位，一方面改变了华人移民素来只能呆在餐馆、洗衣房等地的劳苦委琐形象，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已经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国人的充足自信；而他在持守传统文化美德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的接纳，则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一代移民所具有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在华尔街这一充满着全球化气息并交织着多元文化的前沿地带，陆乔们自觉抛弃身上传统文化因袭中的某些旧质，拥抱和接纳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文化新质，从而更新自己、改变自己。这种改变自然也会带来他们对生存环境的崭新感受。于是，纽约在新移民的心目中，逐渐转变为一个真正能够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熔炼多元文化、展示全球化气息的现代职场。

纽约形象的这一变化，依然和中国历史的现实进程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因为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无论从物质发展还是文化创新方面，都有了更强烈的自信和更强大的实力，这种自信和实力促使

中国更加全方位和深层次地强化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这种加入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新格局，自然促使中国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和更为多元的文化取向，以一种包容万象的盛世情怀，在文化多元共生的21世纪，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梦。这一切，自然为新一代移民提供了审视自身文化价值进而追求平等对话的国际背景和时代契机。也正因此，新移民们才获得了一种平等看待西方世界看待纽约的目光。

五 小 结

从《唐人街》、《纽约客》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然后再到《华尔街职场》，这是四代美华作家在“纽约形象”牵引下展示出的心路历程。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侧面书写着自己对纽约的印象，纽约也因此成为一个被言说、被叙述、被表现的对象。当然，每一代美华作家都是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感受和体验来塑造纽约的，他们眼中的纽约表面看来是真实纽约的展示，但实际上是自己生存境遇、生活观念、文化取向和情感态度的形象显现，纽约在这里最终成了一种主观映像、一种意义和价值的载体。而另一方面，纽约形象在因移民个体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的同时，其形象塑造的背后还明显折射出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幻。

因此，四个时代华人作家笔下的“纽约书写”，表层上是个体经验的独特表述，而深层次上却是民族发展的整体勾勒。由此，关于一座城市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已蕴含着对一个民族心灵史的叙述。也就是说，一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已经升华为一种宏大的历史隐喻。

本文获以下基金资助：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批准号：06BZ.W06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新移民文学研究》(批准号：05J—03)。

①林语堂：《唐人街》，唐强译，第18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②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1卷)，第222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③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④陈晓明：《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载《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⑤⑥⑦裔锦声：《华尔街职场》，第47、116、2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 暨南大学
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保生